



### 可以“翻译”，绝不能“翻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年仅16岁的黄会林为“保家卫国”报名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一次保卫清川江战役中，她所在的团牺牲了百余位战友。最危险的一次，两颗炸弹就在她身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对中国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在这场关乎生死的战争中植入了黄会林的意识之中。1992年，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已经34年的黄会林开始创建影视学科。“当时校领导认为，北师大应该创建中国高校的影视学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辅仁校区，从零起步，在综合类高校开设影视学科，我们是第一家。1993年，我们获得了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点，并首次开办了大学生电影节。1995年，我们被批准开设‘电影学’博士点。”拿到博士后，黄会林夜不成寐，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专业院校对于综合类高校进行影视学科人才培养是存疑的，另一方面，黄会林自己对于如何把北师大的影视学科建设好，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心里打鼓。研究院的领导告诉她她说：“老太太，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博士点是滚动的，如果您做得好，那没问题；如果您做不好，轻则黄牌警告，重则红牌拿下。”年届花甲的黄会林彻夜未眠，心想，被拿下还不如没有做。她查阅了与电影相关的各类报刊，查来查去发现，1995年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大都是西方理论，旁征博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借用社会学、女性主义等西方文化理论覆盖到中国电影上。黄会林顿悟——北师大要想建立中国电影学科，必须高举民族化旗帜。在她看来，中国电影要发展，西方理论、技巧可以翻译，但绝不能翻版，完全照搬西方理论，就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终失去自己。北师大博士点进行理论研究，主张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完成独特的追求。在这一背景下，被同行专家誉为对创建中国影视美学的本土体系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丛书出版，共8本。从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首刊刊登影视论文的先例，这组笔谈共刊发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中国影视美学的四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总结民族化的影视艺术发展规律，是影视理论界应当探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就现有理论来看，绝大多数是西方影视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本土化的影视理论研究比较缺乏，尚未见到‘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系统论题的正式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论题无疑具有“处女地”开垦的重要价值。

###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黄会林特别推崇四个字——知行合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王阳明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就是说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黄会林认为，建立一个学科需要三根支柱，第一根是教学，教学是大学的基本任务；第二根是科研，没有科研，教学没有后劲儿，不能生长；第三根是实践，没有实践，便如墙上芦苇、山中竹笋，理论便成为束之高阁的东西。从第一个五年延续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是黄会林实践知行合一的产物，她从不将大学生电影节当作校园文化活动来看，而将其视作教学中的实践部分。到了第二个五年，黄会林抓住了电影民族化根本——受众。所有一切艺术创造，必须源于受众，检验自受众。“所以第二个五年，我们申请到了关于影视受众的国家级与北京市级课题项目，又做了八本书，名叫《影视受众研究丛书》，这八本书以《中国影视受众论》打头，从人文、社会、受众心理、审美、市场、收视规律，以及‘受众调查与研究’等角度出发，主要研究中国影视受众，其中对外国受众的研究是作为比对样本出现的。”到了第三个五年，黄会林又进一步深入，选取了受众中最独特、最核心

11月的最后一天，84岁高龄的黄会林一大早就来到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第九届年会会场，尽管筹备会议的工作有条不紊，但她还是更愿意亲力亲为，最后再认真检查一遍桌上的嘉宾桌签。此次会议共邀请来自美国、法国、瑞士、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等国嘉宾与我国专家学者共计60余位，他们从“当代与传统”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机制与当前状况。事实上，自2011年开始，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都是黄会林将海内外专家学者“请进来”的日子，新朋旧友欢聚一堂，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黄会林自觉的、民族化的学术立场与落脚点，而回溯过往，这也正是先生创建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的出发点。



的“未成年人”做研究。她带着学生深入到各中小学、乃至“少管所”进行调研，发现少管所里许多小孩的犯罪行为都是从影视作品中习得的。研究中国影视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黄会林采取了广泛的问卷调查方法，调查范围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她沉痛地告诉记者，“当年我们还去了汶川做小学生受影视文化影响的问卷，头一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做了问卷，第二天汶川大地震，整个小学都陷了下去。”10年里，问卷被单独存放于北京师范大学。力透纸背的，还有生命的重量。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15年的岁月如白驹过隙，黄会林也到了古稀之年。她卸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后，又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而问卷调查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并作为其博士生的一门课——《中国影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保留了下来。每年，共有1500份外文问卷面向全球发放，这些问卷，成为反映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力的“晴雨表”。黄会林带领学生对全球调研数据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问题与对策，汇总入每年一部的《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在今年发布的第7本《银皮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成绩，例如中国电影反映、建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在北美地区传播呈积极态势等，也能看到，宣发薄弱成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主要障碍，中文对白与中式表演影响观影效果等问题。

### 电影有“三品”当立民族魂

在黄会林看来，电影有三个“品”字——“商品”，要花钱买票去看；“产品”，质量是产品的特性；“作品”，是一种精神

□本报记者 许莹



产物，必须具有创造性与民族性。黄会林坦言，现在多少有些纠结，大学生电影节已经走过25个年头了，近几年每年申报参加大学生电影节评奖的作品差不多有300部，虽然也有拔尖儿的，但总觉得还不够充分。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电影的三次高潮中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中国电影一路崎岖，风雨兼程。在黄会林看来，中国电影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但在电影方面却是异军突起。上世纪初起步的中国电影，在当时，“鸳鸯蝴蝶派”等影片占据着市场。但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广大民众不再满足于这些言情、武侠电影，而是要求电影紧密结合国家危亡的形势。随后，中国影坛出现了一些有情怀的、进步的左翼电影。1932年，中国共产党派夏衍等人进入电影界，争取团结一批电影人，希望能够使得中国电影有所改观。夏衍在明星影片公司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的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当时中国封建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压迫，以及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狂流》一经推出，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后夏衍又改编了茅盾的《春蚕》，被意大利电影界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起点。《春蚕》突出了“丰收成灾”的悲剧，深沉地展现出外资侵略和连年战乱下的中国农村现实，上映后又一炮打响。在夏衍周围，还有许多像洪深、田汉、阳翰笙、赵丹、聂耳等纷纷加入到左翼电影的创作中，出现了《神女》《渔光曲》《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进步作品。上世纪40年代，《万家灯火》《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都是深受当时百姓欢迎的作品。可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可以立于世界之林的作品。中国电



影的第二个高潮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文学艺术创作也是从旧的规范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工农兵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很多知名老作家抛弃了他们原来熟悉的生活，转过头来写工农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白毛女》《南征北战》《董存瑞》《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儿女》《早春二月》等作品，还有少数民族电影，例如《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阿诗玛》等。人们不应该低估“十七年”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第三个高潮期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伤痕电影与当时学习西方电影精华拍摄的作品，一改往日风貌。例如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李俊的《归心似箭》，张铮的《小花》，王启民、孙羽联合执导的《人到中年》，赵焕章的《喜盈门》，以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导演的作品，类型丰富，大受欢迎。从这三次高潮中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当立民族魂。黄会林认为，电影产业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这种市场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有魂的，而不仅仅是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中国电影创作始终呼唤内容为王，质量为先。”

民族化的治学思路被黄会林延续至今天。她与弟子们共同捐资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林文化基金，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输血”，提供保障。例如由基金赞助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通过外国青年电影人的独特视角，在中方志愿者一对一配合下，每人拍摄完成10分钟中国文化纪录短片。截至2018年，研究院已组织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508名青年，完成了507部短片，斩获100余项国际奖；再如基金设立的“会林文化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中、外各一位获奖者，各奖励人民币30万元，迄今已累计评选出8位中、外籍获奖人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正加入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来。对此，她一再强调，“所有的工作展开和成果呈现，都离不开所在团队和老伴绍武的鼎力支持”。

## 人物传记片的审美突破 ——观电影《黄大年》

□傅逸尘



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表现伟大科学家与生命极限拼搏、在科学的桂冠上打破自己纪录的影片。

黄大年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与贵族般优雅高贵的气质，确实具有绅士的人格和风度。但是在黄大年的内心深处，他又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无论是对待朋友、家人，还是老师、同事，都遵循着“仁义礼智信”的原则。电影《黄大年》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绅士的形象。绅士就是和平时期的骑士。黄大年具有绅士风度，也具有科学研究上的骑士精神。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在黄大年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这也使得他具有鲜活的个人魅力。正是对这种精神特质的着重强调，使得该片本身也具有了优雅高贵的审美品格。对绅士风度的坚守，对艺术的趣味和敏感，对教养的强调，凡此种种，都使得人物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自尊。影片并

没有给黄大年设计过多绅士的服装、高档酒会等等外在元素。真正的绅士会有对信念的坚守，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牺牲奉献，怀揣着一种对孱弱者的悲悯大爱。在我看来，教养、素质、理想、牺牲等等已经构成了黄大年所独有的贵族精神和绅士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以往的中国电影中，确是很少看到的。此外，在日常经验中，该片还特别强化了英雄性的建构；在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强化了崇高、阳刚、壮美的审美表达。影片创作者有意识地强化了主人公黄大年强悍雄健的身姿、霸气自信的话语；突出表现了他的担当、睿智、爱国家、重情义等优秀的精神品质；从内心到体魄，从举止到精神，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兼容东西方审美观念的男子汉形象。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这一思想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因此，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电影或者说中国当代电影，就是一个摆在中国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伟大的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人类的视角，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思考。在我看来，电影《黄大年》之所以显示出不同于以往弘扬主旋律电影的新鲜品质，就在于创作者新鲜而宏阔的“视域”。影片所关注和着重表达的恰恰是可以通行世界的价值判断，是具有恒常光彩的人性亮面，是追寻理想、守护真爱等人类共有的优秀的精神品质。黄大年的科研成果在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人类打开了该领域的科学大门，体现出“学者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科学是无国界的”思想和气度，也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所应有的胸怀、气象。

电影《黄大年》将黄大年个人的成长轨迹与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发展进步紧密牵系在一起，以人物的命运映射历史和时代的转折。影片中，黄大年很轻松地说出：“这件事情我能做到，因为我是黄大年。”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因为我是中国培养的科学家黄大年，我身后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支撑。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果积淀，使得黄大年这个人物的出现显得水到渠成、恰逢其时。黄大年的身上有一种倔强、强悍、雄强、自信甚至是霸气的性格和气场。这种气质和精神是有代表性的，这是大国崛起之后才会有的典型人物形象。

12月3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风再起时》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正值“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开始实施，以方邦彦为首的一批转业军人进入政府、企业等工作岗位，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奋力拼搏、谋求发展的故事。与会专家指出，我们有不少文艺作品，错误地把改革开放40年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精神道德的滑坡作为一对一成不变的关系来写，我们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不仅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物质财富，也获得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古语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将物质与精神二者割裂来看。电视剧《风再起时》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写出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财富，军人风骨是主人公获得成功的基因。

该剧时间跨度长达30年之久，包括南巡讲话、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外贸体制改革、汇率并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WTO、一带一路倡议、十九大胜利召开等节点，每个节点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点。有专家谈到，剧中以方邦彦、何有邻、康宁等为代表的转业军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经历了价值观与信仰的迷失与坚守，时代浪潮与人物命运深度融合，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期、步入深水区等不同时期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休戚相关，同时该剧也关照到社会剧变中个人情感遇到的问题并给予解决方法。也有专家认为，该剧的人物关系网稍显封闭，现行阶段人物关系重于在两个家庭和战友的层面进行纵向构建，专家建议如能丰富在社会层面横向人物关系的编织会更好。

(许莹)